

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事研究

罗宗宇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民族 研究

罗宗宇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著从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的角度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事进行梳理,立足于文本细读,以论带史,运用民俗文化学与叙事学相结合的方法,勾勒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具有民族文化重建意味的民俗叙事图景,探索了二十世纪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小说中不同类型的民俗叙事就中华民族文化重建所持有的不同文化立场、建设路向与叙事策略,同时也揭示出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事在自身流变中所形成的叙事法则,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把握方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事研究/
罗宗宇主编.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667 - 0349 - 1

I. ①中… II. ①罗…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9311 号

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事研究
ZHONGHUA MINZU WENHUA DE CHONGJIAN
——ERSHI SHIJI ZHONGGUO XIAOSHUOZHONG DE MINSU XUSHI YANJIU

作 者: 罗宗宇 主编
责任编辑: 肖立生 责任校对: 全 健 责任印制: 陈 燕
印 装: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32 开 印张: 7.75 字数: 216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7 - 0349 - 1/I · 75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雷 鸣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 - 88822559(发行部), 88821594(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 - 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xls@hnu.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次

绪论	1
第一章 别求新声于异邦	
——二三十年代小说中的启蒙民俗叙事	13
第一节 民俗控制认同型启蒙民俗叙事	15
第二节 民俗控制反叛型启蒙民俗叙事	43
第三节 启蒙民俗叙事的叙事建构	58
第二章 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觉	
——沈从文与老舍小说中的少数民族民俗叙事	64
第一节 湘西少数民族民俗叙事	65
第二节 老舍的满族民俗叙事	100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	
——解放区小说中的革命民俗叙事	122
第一节 革命民俗叙事的先声	123
第二节 旧俗革命民俗叙事	128
第三节 新文化的力量	152
第四章 社会主义文化的探索（上）	
——“十七年”小说中的新风尚民俗叙事	165
第一节 新婚俗叙事	166
第二节 多类旧俗的新变	174
第三节 少数民族民俗的新变	184
第四节 民俗叙事改造	189
第五章 社会主义文化的探索（下）	
——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多元化民俗叙事	196
第一节 政治化民俗叙事余波	196

第二节 启蒙民俗叙事·····	199
第三节 寻根民俗叙事·····	204
第四节 新风尚民俗叙事·····	229
结 语·····	238
参考文献·····	242
后 记·····	244

绪 论

民俗即民间风俗，该词在我国古已有之。《礼记·缁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汉书·董仲舒传》：“变民风，化民俗。”此外，《管子·正世》、《韩非子·解老》中也都曾使用“民俗”一词。至于与其含义相近的“民风”、“习俗”、“风俗”等词，就使用更多。我国不仅古代文献中早就有“民俗”一词，而且还有关于民俗文化的记载专著，如先秦的《礼记》、《山海经》，汉代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民俗”一词作为专门的学术概念在我国的出现源于西学东渐。1846年，英国学者汤姆斯以“folk”（民众）和“lore”（知识、学问）二词合成为一个新词，用来指“古老年代的风俗、习惯、仪典、迷信、歌谣、寓言等等”文化遗物。^{〔1〕}这个词后来逐渐为世界各国学者接受，成为国际通行的学科术语。1874年，英国学者德尼斯在《中国评论》上发表民俗学论文，提出了“民俗”的概念。1876年，他的《中国民俗学》一书在香港出版，作为学术术语的“民俗”一词此时传入我国。但当时这个英文“folklore”一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直至1922年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创办《歌谣》周刊时，才在《发刊词》中第一次使用了“民俗”这个具有学科性质的专用名词。因此，“民俗”一词尽管在我国古代即已使用，但作为学科概念的出现还是20世纪初的事情。后来关于“民俗”一词还进行过一些争论，曾经出现过“民俗”、“谣俗”、“民间风俗”、“民间文学”等不同概念，到1927年，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最终使“民俗”一词成为固定的学科名词。

〔1〕〔美〕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2〕叶涛：《民俗学导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关于民俗的定义有多种,20世纪40年代美国出版的《民俗、神话与传说的标准辞典》一书,其中对“民俗”一词的简明定义有21条。^{〔1〕}在各种有关“民俗”的概念界定中,有两点是带有共识性的:其一,民俗存在于民众之中,民众是民俗的承受者和创造者,是民俗的载体。其二,民俗是被民众传承的一种文化事象。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给“民俗”下的定义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2〕}这一定义目前被广泛认可,它强调了民俗是经过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共同文化。钟敬文还对民俗的外延作了限定,认为“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3〕}也就是说,民俗涉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语言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可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四类。^{〔4〕}民俗在特定的民族、地域、时代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化,是民众传习文化的重要方式,也是规范和影响人们的行为、语言以及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自民俗学产生以来,世界各地研究文化的学者,无不将民俗看作是一种最重要、最基本的文化现象。最早对“文化”一词作出权威定义的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其文化定义中就包括民俗,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5〕}美国学者怀特在其文化定义中,将风俗排列在首位:“在心理学及大部分社会学之外,存在着另外一种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这就是传统的风尚习俗、典章制度、工具、

〔1〕 [美] 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2〕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 钟敬文:《民俗学文化: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页。

〔4〕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5〕 [英] 泰勒:《原始文化》(重译本),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哲学、语言等等，这些我们统称为文化。”^{〔1〕}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也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2〕}而从民俗学学术史来看，在对民俗概念的理解中，不管是文化遗留物说，还是精神文化说、民间文学说、俗民文化说或传统文化说，每一学说虽然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肯定了民俗的文化属性。

作为文化的民俗，既有一般意义上文化的特征，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民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是一个地方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残留物和文化活化石，它有传承性。民俗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现实的存在，是一种传统文化，一种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所说的“小传统”。^{〔3〕}民俗的传承性，使它能联结过去与未来，从中展现出文化的历史。作为文化的民俗同时还是一种下层文化，它具有民间性。所谓民间性是和上层文化相对而言的，它指的是民俗文化由广大俗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创造并且是俗民大众在约定俗成中形成的，它反映的主要是广大俗民的思想意识。另外，民俗也是一种区域文化。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定区域的民俗受不同的地理环境、自然气候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作为文化的民俗还具有民族性，由于民俗兼有文化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双重特征，民俗文化总是在特定的民族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化，民族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放大的区域民俗。不同的民族其民俗是不同的，民俗因民族而异，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表现了该民族的历史传统、心理素质及道德、艺术与宗教观念等，是民族性的体现者与标志物。日本学者矢部贞治在其《政治·民族·国家の話》一书中认为：“传统文化、习俗诸因素是正当的民族性表现，也是民族性的形成力。”^{〔4〕}俄国别林斯基指出：“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性，表现在

〔1〕 [美] 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2〕 [英]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3〕 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70.

〔4〕 转引自《世界民族研究资料》，1982年第21期。

什么地方呢？就在于那特殊的，只属于它所有的思想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就在于宗教、语言，尤其是习俗。”^{〔1〕}在我国，周恩来指出：“风俗习惯常常是一个民族一种”，“民族的风俗习惯比宗教信仰还要广泛”。^{〔2〕}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将民俗视为民族识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本民族的标志”。^{〔3〕}民俗的民族性决定了它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而且是其中重要的基础和主体部分之一，更是民族文化特色的标志。中华民族由 56 个民族组成，按费孝通的观点：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56 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4〕}这一格局的形成是多个民族互动共生的结果。与之相对应，中华民族文化是由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大传统和各民族文化小传统复合而成的。^{〔5〕}其中各民族文化小传统就是民俗文化。钟敬文曾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条干流：“第一条是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条是中层文化，它主要是市民文化。第三条是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6〕}总之，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是其基础部分和特色部分。

民俗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丹纳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

〔1〕〔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 1 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版，第 26 页。

〔2〕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75 页。

〔3〕费孝通：《关于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 1 期。

〔4〕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5〕周明甫、金星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论》，民族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2 页。

〔6〕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见《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7 页。

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1〕一方面，人生活在民俗中，如鱼在水中，“没有民俗，也就没有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学要表现人，表现人的关系、人的事情和人的思想感情，就离不开与之相关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即民俗”。〔2〕作为对生活的反映，文学表现同人们的生活发生着最密切关系的民俗，民俗是文学的表现内容。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化，民俗又制约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思维和心理，进而在作品、作者与世界的三维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俗在文学作品中的被叙述及其结果称为民俗叙事。因此，民俗叙事既是动词性的也是名词性的。动词性的民俗叙事指的是对民俗的叙事建构行为，包括叙事处理的方式和过程。名词性的民俗叙事指的则是作为叙事建构对象的日常生活中的诸种民俗事象及其在文本中的最后呈现形态。民俗叙事具有文化性和叙事性双重属性。按经典叙事学理论，民俗叙事既是故事层面的，也是叙述话语层面的。民俗的文化性决定了民俗叙事本质是一种文化叙事，它一方面是指民族文化制约民俗叙事，另一方面更是指民俗叙事表现民族文化内容，并且传达出创作主体的民族文化意识。用民俗叙事取代民俗描写来研究民俗与文学的关系，绝不是玩弄命名的技巧，二者的区别并不只是名称的不同，其实质性差异在于，民俗叙事作为一种文化叙事，在形式中具有深刻的“意味”，它使叙事具有区域性和文化性，更重要的是它对民族文化进行必要的自识与反思，引领人们对民族文化重建的思考，真正有价值的民俗叙事就在于对民族文化的建设进行探索，这一点恰恰是作为奇风异俗展览的一般民俗描写所不能承受之重。

小说作为一种表现生活容量大、叙事性强的文学体裁，与民俗的关系尤为紧密。中国古代小说中就有民俗叙事。在早期的志怪小说中，写鬼神显灵和卜筮占梦的故事就是精神信仰民俗的叙事。唐宋传奇中，信仰民俗的叙事得到延续。到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民俗

〔1〕〔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

〔2〕钟敬文：《文学研究中的艺术欣赏和民俗学方法》，《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叙事的内容进一步扩大，涉及了桃园结义、巫术文化、婚丧饮食等民俗。在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时的启蒙思潮中，随着小说观念的飞跃，^{〔1〕}小说中的民俗叙事更为广泛，其中有的已具有文化启蒙的功能。“三言二拍”中就有妇女反抗婚嫁习俗的叙事，表达了朦胧的个性解放要求。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五《错调情贾母冒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描写的是贾闰娘与孙小官两心相悦，为了反抗母亲对他们爱情的干预以死抗争，并勇敢地与心上人自由结合的故事。这一故事中的主人公作为普通市民，其对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追求无疑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叙述者对贾闰娘这一大胆、勇敢地追求爱情自由和幸福的女性也给予了肯定，而不再视之为“伤风败俗”。《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写张幼谦、罗惜惜坚持自由恋爱，并以生命捍卫自己的婚姻，终于有情人成眷属之事。当然，小说中更多的民俗叙事尚不具有这种文化思考，多止于常见的传统节日如元宵、端午和清明节的风俗描写。《二刻拍案惊奇》卷五《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的故事以元宵夜为背景，小说写当时京城过节的盛况：“家家户户，点放花灯。自从十三日为始，十街九市，欢呼达旦。这夜十五日是正夜，年年规矩，官家亲自出来，赏玩通宵，倾城士女，专待天颜一看。且是此日难得一轮明月当空，照耀如同白昼，映着各色奇巧花灯，从来叫做灯月齐辉，极为美景。”^{〔2〕}《警世通言》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将端午作为表现主人公陈可常人生的节点，他生于端午，出家在端午，与郡王的际遇在端午，并且死于端午，其中写的端午节民俗亦止于风俗本身，不具有文化思考的功能。“二拍”中也写到了清明节，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和卷三十三《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都写了清明节上坟之事。更有甚者，

〔1〕 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叙》中谈及他编的短篇小说集命名时，说：“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冯梦龙：《醒世恒言》，岳麓书社，1994年版）这可以说是对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认识的最早的公开表露。

〔2〕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80页。

小说在写陋俗时视之为理所当然。撇开鬼神民间信仰叙事盛行且每每灵验不论，以“冲喜”为例，《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作为脍炙人口的婚姻喜剧传奇，故事的发生源于民间习俗“冲喜”。刘家的儿子刘璞订了孙家的女儿珠姨为妻，刘璞有病，而其母定要为儿子早娶冲喜。结果由于种种巧合再加上乔太守的智慧，将一对人的悲剧变成了三对人成眷属的大团圆喜剧，小说叙事称赞了乔太守的智慧，但并未对“冲喜”进行批判，“冲喜”习俗在此只有叙事上的意义。《金瓶梅》作为世情长篇，突破了宋元以来小说只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取材的局限，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涉及了当时唱曲与乐户、医药卫生、金银打造、建筑饮食等方面的民俗。另外《聊斋志异》中所反映的民间信仰特别是鬼文化，都是民族文化的展览而非建设之思。《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中的民俗叙事很多，对婚嫁生死、穿戴饮食、节日娱乐、园林建筑和民间信仰都有大量叙述。尽管小说中宝黛的爱情悲剧闪现出反封建文化的光芒，但从其中的民俗叙事来看，依然局限于民俗风情的展览，对民间信仰的神秘文化也是给予认同，并不具有探索民族文化重建的功能。因此，晚清黄伯耀指出：“吾国向之小说家，如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蒲松龄、金人瑞等等，其论著之遗传，馈赠后人不少矣。然其时欧西风气，尚遥隔于太平洋以西，闭关鄙塞，风气未开。故其所为小说，大为社会之欢迎，未尝不足以取裁后进；而社会风俗，终莫由改良蛮野，而同化于文明之区域者，抑又何耶？吾思之：盖非小说无文之患；而鬼神梦幻之事，及种种阴鹭报应之谰言，有以惑之之患也。如是，故难享小说之大名；如罗贯中、施耐庵辈，终未得而奏转移风俗之效果。”^{〔1〕}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持相似观点，认为志怪小说及其他小说中的鬼神民俗叙事，叙述者视其为“实有”的民俗事象加以表现，没有批判性的立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

〔1〕 耀公：《小说与风俗之关系》，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江苏文艺出版社，第268~269页。

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1〕} 上述简略的考察表明，20世纪前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事在总体上还未能与民族文化的重建发生关联。

小说作家自觉进行民族建设的思考，民俗叙事与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发生总体关联，是20世纪以来的知识事件与叙事审美冲动。近代中国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以后，西方文化尤其是启蒙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迅猛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维新变革的思想文化中，一些注重开通民智的思想理论家致力于小说观念的更新，提出“新小说”或“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小说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崇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作为国民思想启蒙的推动者之一，于1901年4月29日至5月28日在《清议报》连续发表了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从中国国民的“理想”、“风俗”以及历来的统治者为实现统治所采取的“政术”等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积弱之源”。他从强国的观念认识出发，把小说当作启蒙工具，肯定小说对于“新民”及变民俗的作用。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鼓吹：“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说。”^{〔2〕} 梁启超的这一小说主张是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观点的延续，他们认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2〕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1〕}这一观点在当时得到了普遍认同，如陶祐曾说：“吾今敢上一巩固完全之策，以贡献于我特别同胞之前曰：欲革新支那一切腐败之现象，盖开小说界之幕乎？欲扩张政法，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2〕}另有无名氏、耀公等也充分肯定小说的作用。^{〔3〕}西方文化的输入，小说观念的剧变，小说地位与作用的大力提升，使小说与文化风俗的变革关系被人重视，在这种文学与文化背景下，20世纪初小说中的民俗叙事开始承担民族文化重建的思考责任，其中一些小说自觉对民俗中的陋俗进行了批判。

陋俗文化是特定时期内体现于风俗惯制上的并为传统人伦文化所认同的文化糟粕，^{〔4〕}它又集中体现在女性文化、信仰文化和婚姻文化等方面。1905年发表于《新小说》第二卷的《黄绣球》就是从女性缠足的陋俗批判出发来写妇女解放问题的小说。黄绣球本是一个旧式女子，后来受西洋文化的影响觉悟起来，从事妇女改造运动。她鼓吹放足运动，批评“女人只要学习梳头裹脚，拈针动线，预备着给人开心，充男人使役”。^{〔5〕}小说《中国之女铜像》、《天足引》等也批判

〔1〕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2〕 陶祐曾：《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江苏文艺出版社，第739页。

〔3〕 例如无名氏：“顾昔日以小说而愈坚其鬼神之信，今宜即以小说而力破其鬼神之迷。”（无名氏：《〈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见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江苏文艺出版社，第139页）耀公：“信矣乎！风俗之开明，诚小说为之导师。然于此扶翊风俗之进步，则小说之命意、之行文，更未可苟然已也。”“世界现象，西风输灌，人人有文明之思想，有自强之志气。鬼神也，而以为迷惑；风水也，而以为荒诞；命运也，而以为倚赖；阴鹭也，而以为虚渺。……风俗之美满，将由此而导其流矣。信矣乎！风俗之开明，诚小说为之导师。”（耀公：《小说与风俗之关系》，见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江苏文艺出版社，第268～269页）

〔4〕 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5〕 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女子缠足的习俗。“我国的女子，大半脚小伶仃，怎么去干得事业。第一层办法便是要把缠脚的习惯除去。未缠的孩子们，永不去替他再缠；已缠的，也用药水洗刷，慢慢的放大，使他复原起来……所以这放脚，是第一层功夫。”^{〔1〕}反对封建迷信，也是20世纪初小说中民俗叙事的一个重要内容。壮者的《扫迷帚》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小说旨在反对一切迷信，它以苏州为主，旁及各省的迷信风俗，可以称作“苏州迷信风俗志”。书中列举的迷信风俗，种类繁多，从反天命说开场，一直到巫觋社赛。小说用两弟兄的辩论，以表弟作反对派，对他们所见的迷信事实，逐一加以说明批判，其中第二十回还直接以“沿陋习请僧尼礼忏”为题，是晚清最有影响的一部启蒙民俗叙事小说。作者认为“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欲改革习俗，破除迷信正是主要的一环：“须知阻碍中国进化的大害，莫若迷信。你们试想：黄种智慧不下白种，何以到了今日，相形见绌？其间必定有个缘故。乃因数千年人心风俗习惯而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大凡草昧初开之世，必借神权。无论中西，皆不能越此阶级。中国唐虞以来，敬天祭鬼，祀神尊祖，不过借崇德报功之意检束民智。自西汉诸儒创五行之论，以为祸福自召，而灾祥之说大炽。于是辗转附会，捏造妄言。后世变本加厉，谓天地鬼神，实操予夺生死之权，顺之则吉，逆之则凶。由是弃明求幽，舍人媚鬼，淫祀风靡，妖祠麻起。自宫廷以至外臣，自士夫以至民庶，一倡百和，举国若狂，醉心于祈禳祷祝，遗传之恶根性牢不可破。虽今日地球大通，科学发达，而亿万黄人，依然灵魂薄弱，罗纲重重，造魔自迷，作茧自缚。……故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2〕}小说中的民俗叙事让位于科学理论的宣讲，有益于启蒙教育，但削弱了小说的审美价值。^{〔3〕}此外，茧叟的《瞎骗奇闻》写的是一个叫赵泽长的土财主“极相信算命的话，弄得一败如灰”，一个叫洪士仁的穷人“极相信算命的话，弄得身败名裂”，下街

〔1〕 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

〔2〕 王继权：《中国近代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555页。

〔3〕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行乞，说明了“这些瞎子，本说的是瞎话，万万靠不住的”，从而针砭了“穷算命，富烧香”的信仰民俗。嘿生的《玉佛缘》也暴露了看相、算命、测字、风水等迷信的危害，体现了反定命的思想。还有揭露愚昧野蛮的指腹为婚习俗的作品。1909年包天笑在《小说时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一缕麻》，小说女主人公某女士是一位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美貌女子，却自幼被许配于“其父同寅之某氏子”，而“某氏子”长大后却成了一名痴呆人，女主人公试图离婚反抗终因病而复归认同。在叙述中，虽然小说结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某女士对旧俗的反抗，但作者多次批判父母包办、指腹为婚的野蛮性，或借女主人公之口发议论：“今吾国婚姻野蛮，任执一人而可以偶之，究竟此毕生之局，又乌能忍而终古，则离婚之说，儿殊不欲厚非也。”^{〔1〕}或愤曰：“是实以人家女子为玩具，尚有一丝人权也耶？”^{〔2〕}除以上着力于文化风俗变革的社会小说之外，晚清个别言情小说也通过对传统婚俗的批判来表达文化重建的思考。如符霖的《禽海石》，以第一人称秦如华来叙述，激烈批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俗，呼喊：“倘然没有孟夫子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话，我早已与阿纫自由结婚！”另外，谴责小说也在纠弹风俗方面有所贡献，如鲁迅所言：“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3〕}总之，相对于古典小说，20世纪初小说中的民俗叙事明显具有了思考民族文化重建的功能，陋俗的发现为后来新文学中的启蒙民俗叙事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奠定了基础。

本课题从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这一特定视角出发研究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事，不是将小说视为认识民俗图景的资料文本，也不对小说中的民俗作民俗运动史考察，研究立足点在文学。课题在

〔1〕 钱乃荣：《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第1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2〕 钱乃荣：《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第1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页。

20 世纪小说史的框架中按时间顺序分五章论述多种形态的民俗叙事，第一章论述二三十年代的启蒙民俗叙事，第二章论述二三十年代的少数民族民俗叙事，第三章研究解放区小说中的革命民俗叙事，第四章研究“十七年”小说中的新风尚民俗叙事，第五章研究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多元化民俗叙事，结语部分探讨 20 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事的特点和启示。在每一章的研究中，以该时期社会文化思想状况为背景，以民俗文化学和小说叙事学为主要理论资源，从民族文化的重建这一特定视角出发来梳理民俗叙事，择取典型作家的典型小说文本进行细读，论析该时期居于主导且具有民族文化重建意味的特定民俗叙事。从总体上来看，对 20 世纪中国小说中民俗叙事的描述与考察，以时代为经、文化语境为纬、个案研究为点，通过叙事分析连点成线和面，揭示那些具有文化重建意味的民俗叙事对民族文化重建的思考及其所形成的叙事法则，力求达到文化的、历史的和美学的统一。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本课题是从中华民族文化重建这一特定视角出发的研究，视界限定了世界，因而并不是对全部民俗叙事图景的还原，假如想从本课题研究去获得 20 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全部民俗叙事图景，那必然会让期待落空。另外，在具体的分析论述中，笔者坚持从小说文本出发，采用以史带论的处理方式，因而有时可能会给人以史料长于识见之感。不过，鉴于课题选择的是 20 世纪小说中那些最具典型性的民俗叙事文本内容，它自有其合理性。